

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

堀 真 琴 岡田 丈 夫

塩田 庄 兵 衛 三上 正 良

合 著

目錄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1.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的發生及其性質

2.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在戰爭和法西斯統治時期

第二章

戰後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1.

美國佔領制度與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2.

日本社會黨的歷史過程

3.

黨組織

4.

社會基礎

第三章

統一戰綫的展望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1.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的發生及其性質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個問題提出，是從一九一八年的「半騷動」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日本資本主義正式進入独占資本主義階級。工人、農民掀起激烈的鬥爭，組織了工會和農民協會，加強了戰鬥力。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國革命，震碎了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肝膽，給工人農民以極大的鼓舞。自此之後，世界資本主義便進入總危機階段。「半騷動」宣告日本的總危機的開始。被開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群眾行動的爆發所震驚的日本統治階級，建立原敬的「政黨內閣」，答應舉行普選，想以資產階級的改革來緩和群眾。以前輩固已經開始動搖的天皇制的基礎。同時也產生了扶持阻止工農群眾走向革命的、改良主義的，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與農會運動的必要。明治時代的推殘工農群眾自主組織的政策已經不能通用了。於是出現了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吉野作造、安部磯雄、竹川豊彦相結合的、作為工會和農會始祖的鈴木文治、松岡駒吉、西尾末廣、麻生久、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等的以勞資協調主義和改良主義為領導的工會與農民協會運動。

一九二二年七月，日本共產黨成立，一開始就站在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的最前列。在這以前，日本曾有過一九〇一年的「社會民主黨」（成立後即解散）和一九〇六年的「日本社

曾黨」(繼續了一年)，都因鎮壓立即被解散後，便沒有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共產黨則最早誕生。日本共產黨以國際主義精神，提出打倒天皇制和廢除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綱領，作為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在非法的情況下成立的。統治階級當然對共產黨進行鎮壓，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時，統治階級對革命工人施以猛烈的恐怖手段。由於共產黨的出現，社會民主主義者感到必須明確自己的立場，他們一開始就展開了堅決的「反共」運動。鈴木、松岡、西尾等竭力阻止他們所控制的日本勞動總同盟的下層會員的左傾，因此，引起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一九二五年總同盟終於分裂，左派組織了「日本工會評議會」。

一九二五年，統治階級通過了普選法，對群眾表示讓步，但一方面又制定了治安維持法，嚴厲地限制左傾。社會民主主義以政黨形式出現也從這時開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結成了作為第一個合法無產政黨的「農民勞動黨」，因說有共產黨的影響，二小時後即被解散。第二年，一九二六年三月，又結成「勞動農民黨」。不久，由於下層群眾的壓力，對共產份子「開放門戶」，右派分裂出去，於同年十二月分為右派的「社會民眾黨」和中間派的「日本勞動黨」等三黨。此外，始終是最右翼道路的平野力三組織了叫作「日本農民黨」的國家主義的地方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本身起着分裂的作用，再加上日本島國的根本性，宗派意識很濃厚，因此，在後來的工會和政黨中，很短時期內幾次三番的分裂與合併，同時在分裂與合併的過程中所表現的各分派的特點，可從各派的陣營中看出。

(一) 以大山郁夫為委員長、細迫兼光為書記長的「勞農黨」，起着轉入地下的共產黨的合法舞台的作用，聯合共產主義者和戰鬥的工人、農民，以評議會和日本農民協會的一部份為地盤，勇敢地進行鬥爭，起着積極的作用。三、一五事件（一九二八年）後被解散，以後便喪失了作為獨立勢力的發展的可能。

(二) 「社會民衆黨」是由安部磯雄、鈴木文治、片山哲、賀川豐彦、赤松克麿、松岡駒吉、西尾末廣、半澤滿亮、野溝勝等人組成。這些所謂「社民系」，主要是控制總同盟、海員工會、官營軍事工廠、紡織工廠等大工廠的工人，有比較安定的基礎，公然提倡勞資協調主義。「社民系」是一群與資本家打交通的工會官僚和工會頭子。

(三) 「日本勞農黨」是由麻生久、三宅正一、三輪壽壯、須永好、杉山元治郎、淺沼福次郎、河野密、加藤勘十、河上丈太郎等人組成。這些所謂「日勞系」是以日本農民協會的一部份，和從「總同盟」分裂出來的日本工會同盟作為立足點，它的基礎是以弱小的中小工廠的工人居多，沒有像「社民系」那樣安定的地盤。他們的特點是「口頭上革命，實踐上怠工」，裝作「左」派，因此，得到一部份知識份子的支持，同時幹部的出身也以知識份子居多。「日勞系」雖被稱作為「中間派」，其本質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民系」沒有什麼兩樣。

(四) 因為害怕對共產黨的鎮壓，認為共產黨在日本尚嫌過早的「解黨派」，建立了以山川均為中心的合法馬克思主義團體。也就是豬俣準南雄、荒畑寒村、鈴木茂三郎、高津正道等

參加的勞農派小組。後來，他們中間高野實、山花秀雄等人組織了合法的左翼工會「全評」，黑田壽男、岡田宗司等人作為「日農」（日本農民協會的簡稱——譯註）的左派進行活動，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等人組成了「日本無產黨」，（因此也稱「日無黨」）這些人一大半是知識份子要筆桿的。勞農派製造了主張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共」理論，熱烈地進行「資本主義論爭」，其組織的地盤最弱，實際的影響也最小。

這些從公開的右翼工會頭子看起來似乎只是「革命」的勞農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共同特點是提倡「天皇主義」與「反共主義」。

日本資本主義是以農村封建性地盤，結合天皇制國家權力，並借助於它的暴力統治發展起來的。本來充當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接受從他佔資本的超額利潤中所擴出的高額工資的工人貴族、以及被統治階級收買，並給以特權作為忠實的奴僕的工會官僚和不斷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但是日本資本主義是在低微工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它沒有養工人貴族的餘裕，在政治上也沒有實行民主的餘裕，因此工會連一點自由也沒有。統治階級對工會，如果金錢不能買到，就用拳頭來統治，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日本社會每個角落都為天皇制所統治，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權力壓迫工人。松岡駒吉和西尾末廣之流的工會頭子，亦即工會官僚指使其爪牙統治工人，和資本家打交道，他們在官僚面前也有「面子」。他們在廠礦中張下了封建把頭的統治網，尤以紡織女工最為典型，工人不僅受了壓迫，背地飲泣，而且還信賴和支持這些工會中的「大亨」，這些事實不容忽視。為了打破封建性與資產

階級統治而勇敢地進行鬥爭，並且有進步意識的工人當時還在少數。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天皇制是有無相通的，他們也不對天皇制進行批判，也不反抗，成為它的本家，靠它吃飯。安部磯雄和西尾末廣說：「天皇制太可怕了，簡直不能談。」，他們這樣地逃避現實。這與勞農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天皇制在本質上已消滅了，沒有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必要，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共產黨所提出的為日本的民主化必須打倒天皇制的主張，以及共產黨所指出的革命的方針，一致採取敵對的態度。「天皇主義」和「反共主義」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也就是「反革命主義」。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它只有極其薄弱的物質基礎，主要是依靠群眾的落後意識和暴力統治，因此它是極其狹隘和不安定的，也沒有很大的發展地盤，天皇制不相信社會民主主義具有統治群眾的力量，但對它的防範與鎮壓，雖不能與共產黨相比，但也從未懈怠過。因此在極權主義天皇制下，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不會壯大。

己 日本社會民主主義在戰爭和法西斯統治時期

靠近統治權力甚於靠近工農群眾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戰爭和法西斯統治時期大顯身手。社會民主主義的頭子們加速地擴大協助戰爭的範圍與程度，墮落為社會法西斯，暴露它的純粹法西斯的面目，顯示了社會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距離是那樣接近。

侵略滿洲開始後，社會民衆竟提倡「滿蒙的社會主義管理」，把侵略戰爭合法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社民黨第二次中央委員會決議）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五、一五事件（三二年）、二、二六事件（三六年）以及直接的暴力行動，以軍部為先鋒的法西斯主義體系的進展過程中，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人的「日勞系」幹部，積極地協助軍部，替法西斯主義掃清道路。「社民系」的赤松克麿派於一九三二年結成「日本國家社會黨」，公然主張法西斯主義。一九三二年七月，社會民主主義各分派合併，組成「社會大眾黨」，這個黨的歷史也就是協助戰爭的歷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開始，日本進一步推行戰爭政策時，社會大眾黨稱這個戰爭為「日本民族的聖戰」，它所領導的「總同盟」的大會上宣誓在「事變中絕對消滅同盟罷工」，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協助進行戰爭的奴隸性的勞工組織——「產業報國會」運動由國家發起後，社會民主主義幹部首先恐後地為「產業報國會運動」効勞。如果說麻生久、河上丈太郎、河野宏、三輪壽壯之流的「日勞系」比松岡駒吉、西尾末廣之流的「社民系」更為積極，那是不對的，因為「社民系」當時欲以高價出賣對「總同盟」的統治權，藉以維持現狀，而組織基礎薄弱的「日勞系」並不急於跳進產業報國會，與「社民系」平分秋色。這個「社民系」在一九四〇年「總同盟」被強制「自發的解散」時，也沒有反抗。西尾在議會中發表贊成國家總動員法的演說，他說：「如果產業報國會起用我，我將不輸於三輪君全力進行工作。」由於他這份獻媚於軍部，甚至引起了資產階級政黨的反感。最後他的講話被人抓

住了破綻，將他趕出議會。一九三九年，社會大眾黨日益右傾，甚至欲與起國家主義者中野正剛的東方會合併，第二年，社會大眾黨解散，加入大政翼贊會，與資產階級政治家坐在一起，同心協力進行太平洋戰爭。戰後理應追究這一關係，這些積極的戰爭協力者，其中一份戰後一度曾被整肅，但不久即重整旗鼓，又以社會黨幹部身份出現。

社會民主主義幹部在法西斯主義面前，解除了群眾的武裝，當他們協助戰爭，驅使工人進行奴隸勞動時，也是說「為群眾利益，代表群眾」。他們在產業報國會的官僚機構中謀求「官半職時」，也是「為了工人」。因此，群眾受了欺騙，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寄以期望，支持他們。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選中，社會大眾黨開始登場。三七年四月的選舉中，無產階級的名政黨空前未有的獲得了一百萬張選票，有三十八名議員當選，這說明由於法西斯主義体系的進展，戰爭危機日益加深，工人、城市小市民對社會民主主義者寄以期望。

當時，在國際上，西班牙、法國和中國的反抗法西斯人民戰綫和民族統一戰綫獲得了成就，共產國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五年）通過了採取「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綫」的策略。當時日本對於「人民戰綫」的期望也很大。以鈴木茂三郎、加藤勤十為中心的「日本無產黨」，這時也號召結成「人民戰綫」。當時日本的工人與知識份子之間，也有過部份的統一戰綫運動的動向，但工人階級沒有展開廣大的有組織的運動。同時，共產黨因被鎮壓，處於崩潰狀態，只能進行部份的小組的活動，未能成為統一戰綫的核心。而最大的社會大眾黨施着「總同盟」的工人群眾，採取積極協助戰爭的方針。日本無產黨和勞農派只是在口頭上叫

喊「人民戰線」，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幹。他們與共產黨嚴格地劃清界線並與社會大眾黨對立，加強了宗派主義情緒。所以，「人民戰線」只是徒有個名詞，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一九三七年，鈴木、加藤、全國評議會、勞農派被檢舉後，為了統治者增強天皇制法西斯的自信心，小堀大藏地將它渲染為「人民戰線」事件，實際上是不准下層群眾中有不協助進行戰爭者存在。當時的內務大臣、末次海軍大將聲明「自由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因此，鈴木、加藤之流不能稱為「反戰的鬥士」。

被出賣的勞動群眾，毫無抵抗，或者讚美法西斯主義的暴力，被拖入了毀滅性的戰爭。過去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對戰爭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經驗。

第二章 戰後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1. 美國佔領制度與日本社會民主主義

甲、戰後的危機

太平洋戰爭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美軍的佔領，使日本的政治經濟的一切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階級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變化。當然問題不止於此，即日本出現了過去戰前不成為問題的民族存亡的危機問題，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決定性的契機，貫穿了日本國民的全部生活。美國佔領下的社會民主主義也與以上問題有聯繫。

如前所述，戰前日本帝國主義，沒有培養社會民主主義的物質餘裕，同時在政治上也沒有感到有太大的必要。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在數量上與質量上，對於日本的政治動向，不是起決定性的因素。但戰後，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大大地躍進，今天不僅一躍成為在選舉中獲得一千萬選票的大政黨，而且成為日本統治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構成部份。一九四五年八月以來，僅僅數年中，發生了這樣劃時代的急劇轉變，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由於戰後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的危機的加深和擴大；第二，由於日本已成為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中的特殊部份。

由於戰敗和外國軍隊的佔領的巨大打擊，使日本統治機構發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為了要求生活的安定和民主，以工人階級為革命的前衛站在最前列，展開了尖銳的廣泛的鬥爭。

因此，形成了真正危機的形勢。統治者為了擺脫這個危機，動員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經濟、道德上的手段，其中除了仍舊使用天皇制官僚特有的鎮壓人民的「鞭笞」政策以外，還同時使用「餌」的政策。其最重要的一環，雖然不是出於它的本意，但對社會民主主義，採取了緩和和讓步的政策。正如社會黨建黨的情形所表明的，「解放」以後開始活動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天皇制表示極其馴順的以舊「社民系」及「日勞系」為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建工作的方向，大部份統治階級不僅沒有感到恐怖的必要，而且還對它有親近之感。

反過來，這一方面充分符合於美帝國主義佔領者的目的和利益。美國的佔領日本政策，其目的在於把它的以前亞洲的有力的帝國主義競爭者日本變為粉碎中國革命、進行反蘇戰爭的政治——戰畧基地，把日本作為統治世界的一環。因此，美國佔領日本的政策，是作美國的世界政策的重要部份而變化和發展的。換句話說，因佔領政策和佔領制度而產生的日本國內矛盾，以及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日本國民的鬥爭，必然會與世界人民反對美國的稱霸世界與戰爭政策的、爭取獨立與和平的鬥爭相結合，並相互影響，從而抵制美帝國主義。

乙、「扶植」和抵抗

美國佔領者暫時拔除了過去日本統治權力中的危險的毒牙，使之符合於佔領政策的需要，並在這個基礎上對日本實行有系統的掠奪和政治奴役，推進日本的軍事基地化。但這個基

礎是極不安定的，它在包括民族資本在內的人民大眾的民族的反對與抵抗鬥爭面前，不斷地發生動搖。這反映了日本的危機的深刻化。因此，美國佔領者與日本統治階級不得不派遣自己的「走狗」去分裂、動搖和瓦解人民的鬥爭，採取迂迴的戰術。這樣，社會民主主義就在所謂被「扶植」的情形下登場了。但是，如果社會民主主義這一勢力不能起作用的話，那末就必須立即重新物色，如果它還過份軟弱的話，那末，就必須從上而下地加以「扶植」和加強，使之趕上形勢的需要。

然而，戰後不到二年時間，日本社會黨在西七年的大選中獲得七〇〇萬張選票，擁有一四三名議員，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它的成長不能單由上面「扶植」政策可以解釋的。它的基本因素，是由於要求自由、民主和治安安定，要求對現狀作若干變革的人民的力量及其運動的高漲。社會黨的自標成長的聲譽基礎就在於此。實際上，社會民主主義的內部，在根本上也分成兩大流派互相對抗。一個是防止將人民的變革的力量及其運動的主導權轉移到戰鬥的工人與農民及其革命的前衛手裡，而將主導權抓在自己的手裡，把人民束縛在議會政治與合法性的圈子中，客觀上為佔領者與日本獨佔資本服務。另一個它雖包含有許多躊躇和動搖，但仍願和人民大眾一起前進。這兩大流派的內部成份，相互力量的關係，極為流動不定，但始終是在對抗中並存，這是戰後社會民主主義的最重要的特徵。

因此，美國佔領者與日本統治階級承認社會民主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禍害」。具體地說，佔領者和日本統治階級只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起作用的一面——即經過各色各樣的彎路，將

大多數日本國民捲入到佔領制度的網中來——給以指導和支持，並利用它的影響。社會民主主義中對佔領制度的寄生的要素——也就是戰前對天皇制恭順，利用新主人（佔領者）的關係加以擴大和發展而已。戰前，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天皇制的屈從，首先是以反共產主義的形式出現的，戰後它雖然掛着反蘇反共的招牌，但在意義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戰後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合法政黨公然出現在人民面前，它對於日本的整個形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多少也有必要明確地對共產主義勢力表明態度。因此，在「反共」招牌下，除了在反共名義下企圖將自己的反人民、反階級（以及反民族）的立場合法化的有意識的反共主義者以外，還有在行動中意圖適應人民大眾前進，由於反共使其在事實上開始失去了決定性的位置的反共主義者。後者雖提倡反共，也不過是盡力想保衛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特徵的動搖性而已，也不過是可憐到極頂的反蘇反共而已。

社會民主主義者內部的這一對抗的因素意味着佔領制度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關係，不能單由「扶植」這一面來加以說明。戰後八年間「扶植」（即從屬）這一面的逐漸加強的過程中，其抵抗的潮流也日益高漲。

反法西斯戰爭中美英蘇的聯合，在戰後短暫的時期中，即佔領階段，實行了「民主化」政策，在人民大眾的鬥爭門高漲下，社會民主主義在佔領當局毫無干涉的情況下（當然是出於佔領者的「好意」）成長壯大，但由於它和共產主義對立，拒絕結成統一戰線，明確了自己的立場，適應了佔領制度。繼後，進入了利用社會民主主義、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

社會黨國際，進行「冷戰」時期，在日本進入了重建與復興資本主義，並由道奇方案使日本屈從於美國，準備建立軍事化基礎的階段。在這一時期，美國佔領者在二、一總罷工中對日本工人階級的巨大的革命力量進行了鎮壓，利用以社會黨為首的片山內閣，來避免當前的危機，從片山到蘆田一直到第三次吉田政府，統治者推行露骨的掠奪政策，並使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統治機構密切結合，佔領者在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佔領者和民族壓迫者的本質。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以二、一總罷工的被鎮壓為轉機，相反更加尖銳，它不僅開始和佔領制度與日本獨佔資本的政策堅決地對立，同時從這一時期的後半段，日本人民開始了反對佔領制度的永久化與喪失民族獨立的危機的鬥爭。這一民族鬥爭與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關係明確了。上述工人階級及人民的鬥爭，促使以社會黨左派為中心的勢力，對片山內閣宣佈自己是「黨內的左翼」，更在片山內閣至第三次吉田內閣這一期間，使左派對黨進行批判的傾向日益增大。當然，社會黨左派領袖鈴木、加藤所發表的「反共聲明」，以及他們奉養「民主化同盟」的分裂主義方針，對於當時工人階級與人民鬥爭，起了極大的影響，但由於人民鬥爭的成長壯大，使這種當初所發生「否定作用」自下而上地加以克服。因此他們的意圖最後未能得到滿足。

當朝鮮戰爭爆發，世界規模的戰爭勢力與保衛和平運動的對立以及戰爭勢力的後退，美國主義更進一步地暴露化時期，美國的佔領政策是急速地促使與日本單獨媾和，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使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屈從於美國。這當然使人民的生活遭受重大的痛

苦，使矛盾尖銳化。特別是反對單獨媾和、要求全面媾和、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人民民族鬥爭進入了決定性的階段。這一力量已經不允許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個統一政黨存在下去，社會黨在組織上已經分成左右兩派，當然問題不止於此，社會民主主義在整體上已經產生了分解和方向轉換。具體地說，社會黨內部分成事實上已與資產階級的第三黨毫無兩樣的右翼和在一定立場上代表新局面下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在口頭上高唱「急進」，而實際上未能脫離機會主義的「左翼」，此外還有企圖解決社會黨內部的動搖性，抓住民族問題環節的左翼。應該指出：這些左右的區分，當然有右派社會黨、左派社會黨、勞農黨、社會黨再建派等黨派之分，但各左右派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相互影響和相互流動的。

丙、統一和分解

對帝國主義來說，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與「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它所必要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體過分公然反動化，那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自殺，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不利的。他們對小資產階級與大部分工人階級所抱的要求與希望，提出一些急進的口號。例如：左右兩派社會黨特別是中央幹部對於共產黨提倡的共同鬥爭和統一鬥爭，一貫予以拒絕，但在人民前進的促使下，也不得不以各種形式進行工會的鬥爭，反對基地鬥爭、和平運動，提出自主貿易等要求。他們將運動停留在自上而下的議會主義所能統制的範圍內，不使運動發展成為真正的羣衆運動，却與共產黨所參加的運動平行。自從朝鮮停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對日

本施以壓力，積極地促使日本轉入以經濟軍事化為基礎的新設備體系。因此在它的政策上加強法西斯壓迫的條件下，各階層人民所進行的為滿足大大小小的要求的鬥爭，都帶有爭取民族獨立與保衛和平的性質。因此上述社會民主主義所起的作用，不但是反階級的，而且是反民族的。特別應該引起注意的即所謂「第三勢力論」、「社會主義政權論」和「東南亞貿易論」。對於這些「理論」的詳細評價以後再加論述。這裡應該指出的是，這些理論使人民羣衆鬥爭公式化，同時也與世界主義和民族排外主義混淆不清。

工人階級和人民正接受着「左翼」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並不能完全分離，這是事實。但是當我們說到「左翼」正在加強各種鬥爭，使「左翼」和右翼發生變化。在這種羣衆運動的基礎上，社會民主主義正在分離，亦即聯合左派。幹部和普通黨員、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感情、思想和行動正在日益分離和破裂。勞農黨的結成與社會黨再建派活動的發展就証明了這一點。勞農黨和社會黨再建派刊稱為真正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但由於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在民族鬥爭中，「左翼」與右翼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內部必將發生變化。它的方向或者是傾向佔領制度和帝國主義，或者是追求民族解放，兩者必居其一。

2、日本社會黨的歷史過程

日本社會黨自戰爭結束後不久建黨以來，已經有八年的歷史。在這激盪的國際形勢中，美國奴役日本的佔領政策，以及日本反動勢力與工農羣衆的壓力，使社會黨起了些什麼反應。